

# 陈夔龙科举观考述

黄真金<sup>1,2</sup> 林 坤<sup>2</sup>

(1.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2.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 科举观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看法。陈夔龙是清末贵州籍进士中的国家重臣, 深受科举教育影响, 他亲历清末科举革废之变, 反对科举革废, 对科举制度高度认同, 综观其一生与科举相关的言行, 可以看出: 陈夔龙认为科举考试神圣非常, 科举制度是立国安邦的根本典章, 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 他高度认可科举制度在教育、选材等方面的功能; 认为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严谨而规范。

**关键词:** 陈夔龙; 科举观; 晚清; 贵州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5)4-070-073

**DOI:** 10.13713/j.cnki.cssci.2015.04.013

陈夔龙(1857—1948), 字筱石。光绪十二年(1886)贵州籍进士, 清朝末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他曾亲历清末科举革废之变, 是前清封疆大吏中唯一亲历抗战胜利的一人, 一生著述颇丰。考察陈夔龙的科举观, 本文认为, 他对科举制度总体上来说高度认可的。

## (一) 视科举考试为神圣

陈夔龙认为科举考试庄严神圣, 甚至暗含神旨, 他对此满含敬畏之情。关于自己参加会试的经历, 他有一段虔诚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回忆。在丁宝楨的总督府当幕僚时, 丁宝楨嘱托他草拟了一份恳请朝廷立祠表彰军中为国捐躯的将士的奏疏, 他颇为用心, 因为奏疏要求言辞恳切, 文笔情深, 为朝廷所采纳。后来进京会试,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这些将士们感谢他: “夜中梦至一官

廨, ……堂下武装军事累累, 朝向余叩首讫, 欢欣鼓舞而去”。在接下来的考试中, 就像有神灵相助一般, “第觉笔尖飞动, 不假思索, 汨汨其来, 三艺一气呵成。冥冥之中, 殆有神助。”<sup>[1]14</sup>——一切仿佛有神灵主宰, 在他看来, 在士子云集的会试中, 自己能取得成功, 不能少了冥冥中的神助。此外,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在担任河南乡试主考官时, 他再一次感慨: “昔闻科场巨典, 神鬼实司纠察, 此言颇信”。面对考场如同兵临大战般的肃穆氛围, 他说: “此无他, 功令本极严肃, 人心先存敬畏。命多士功名之路, 实隐寓天人感召之机”。<sup>[1]150</sup>在他看来, 世人首先要对科举考试心存敬畏, 以虔诚的态度去勤奋努力, 才能得到上苍的认可与回馈, 这其中蕴含着天人感应的道理。读他所描述的科举, 始终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如同中国古代视皇权为神圣一样, 人们仿佛是通过神圣的科举制度, 在执行上苍与神灵的旨意。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科举通史”(13JJD880010)。

**作者简介:** 黄真金,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教育史; 林坤,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教育史。

## （二）视科举制度为关乎国家存亡的典章制度

陈夔龙认为科举制度是立国兴邦的重要典章,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秩序的重要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更是稳定民心的基础。“国家龙兴辽沈,定鼎燕京。援照明制,特开科举,以系人心而光国典。”<sup>[1]223</sup>他相信,科举制度是有利于维系民心的重要典章,对维护社会安定至关重要。光绪二十七年(1901),德国官兵所交还的贡院严重被毁,他痛心疾首,三年后,在请求修复京师贡院的奏折中写道:“贡院系伦才之地……我朝定鼎燕京,首开制科以号召天下士。二百数十年来,得人称盛”。<sup>[2]133-134</sup>“况多年积学之士,或年齿已长未能取入学堂,留此亦为进士之阶,俾皓首穷经,得以操刀一试,不至稍生缺望,则修复贡院非徒因仍旧贯,实足以广登进而系人心。”<sup>[2]133-134</sup>在他看来,在国难沧桑、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之际,修复京师贡院于当时的朝野上下,实具有“广登进而系人心”的重要意义。科举停废,他痛苦地叹惜那是“国运告终”的信号:“至广方言馆、宪政编查馆、督办政务处立,而科举遂废弃不复存。状元之名,从此中绝。一朝之国运,亦从此告终焉”。<sup>[1]223-224</sup>时人对科举停废后社会混乱状况的认识不足,他指出:“末世不察,至薄帖括为小技,而未审先朝驾馭英雄之彀,即在于此。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逐成今日无君无父之变局”。<sup>[1]150</sup>“士气浮嚣,无君无父”,于他而言,就是他所亲历的清廷逊位之后,旧法已废,新制未立的混乱社会的真实写照。

## （三）认可科举教育的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在教育方面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提升文化的普及率、传承以儒学精神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等方面。陈夔龙记述了顺治四十五年(1706)至光绪三十年(1904)之间的状元出处:“由丙戌截至光绪甲辰废科举之日止,计共得会试一百十三科,状元共一百十三人……江苏一省几得半数,苏州一府计廿三人,几得一半之半。”<sup>[1]223-224</sup>在他看来,江苏地区人才鼎盛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影响下该地区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重视文化普及、崇尚儒学精神的教育传统是密不可分的,“窃尝纵观而知其故,自言游以文学

专科,矜式乡里,宣尼有吾道其南之叹。南方火德,光耀奎壁。其间山水之钟毓,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述,家弦户诵,风气开先。拔帜匪难,夺标自易”。<sup>[1]223-224</sup>陈夔龙对科举教育所渗透的儒学精神不仅高度信仰,而且身体力行,视参与科举教育活动为国家选拔人才为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河南乡试,陈夔龙担任主考官,即兴题一楹联曰:“后百十三年,雪苑衡才;公赋月华,我书云物。合万一千人,风檐奏艺;昔吟桂子,今占梅魁”。<sup>[1]150</sup>以此来吟咏时年科考之盛况,其中也充满了对科举制度培育人才之盛功的赞誉。

## （四）歌咏科举选拔优秀人才的功能

陈夔龙八岁丧父之时,正值贵州苗民暴动,道途受阻,无力回乡,占籍贵阳,因科举制度被选拔任用而改变人生命运,他的科举经历,本身就是下层士子向中国官绅阶层流动的真实个案。他对科举制度让自己得以被甄选的恩典始终不忘,陈夔龙于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恩科贵阳乡试中举,58年后的1933年,他沿照旧例重宴鹿鸣——“欣逢盛典,渥承殊锡”。陈夔龙对身边的科举人才也赞誉不绝:“李文忠公,文通武达,出将入相,早依香案,晚博侯封,勋名位业,籍籍都人士之口”,<sup>[1]178</sup>“尝读《论语》,于令尹子文之忠、陈文子之清,低徊往复,不能置之于怀。求诸近世,于吾乡丁文诚公,如或遇之”,<sup>[1]120</sup>“仁和许恭慎公,武林望族,科第传家,一时乡里有‘五凤齐飞入翰林’之誉。公以壬戌进士殿试,高列二甲第二名,例用庶常,时充军机章京。虽列上第,仍呈请归中书本班兼军机处行走。仲父文恪公以公不入玉堂为憾,公弗顾也”。<sup>[1]123</sup>

与他对科举人才的盛赞相对的,是他对清末派赴各国游学的“新式”学子的担忧:“查北洋先后派赴各国游学生共一百九十名,……竟有出洋已七八年,仍未在专科毕业或仍在中学肄业者,尚有专门早经毕业,实练亦有经验,惟以官费之故仍以练习藉口竟不声明还国日期者,……教育前途,何堪设想?”<sup>[2]381</sup>

此外,陈夔龙亲历过科举考试高规格的组织与管理,他曾以朝廷要员的身份入闈河南乡试,甚至不惜以军队维护考场的秩序,足见朝廷用心

之苦。

通过陈夔龙的记述,我们还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在实施过程中,高度重视试卷保密、监考、评阅等方面的工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夔龙时任河南巡抚,担任河南乡试主考官,考生入场点名完毕,已是三更,发完题纸后,“率同提调监试两道暨任差官吏、文武员弁约百余人,赍送此项题纸到至公堂”。<sup>[1]150</sup>为保密与安全,题卷由监考官吏、差役在百余武士的护送下送到至公堂,待主考官升堂主持试卷发放之后,“此时场内人数以万计,灯笼火伞以数千计,堂上堂下火光烛天。而凡百执事视动俱寂,几若衔枚战士,万马无声”。<sup>[1]150</sup>监考官吏约数百人,万余人的考场,如士兵衔枚,静寂无声。陈夔龙对监考所耗之人力、考试巡视的安排与考场上庄严氛围的详尽记述,让人不禁身临其境,既是他所亲历的事实,也是内心真实的感受。光绪三十年(1904年),因京师贡院损毁,科举会试借闱河南,分房阅卷考官、考场巡视官员、办理内部考务官员等,都由京奉派。“揭晓日,余与诸公齐集至公堂升座,拆卷填榜”<sup>[1]154</sup>——分房评卷之后,通常由弥封官将试卷折叠,封藏考生姓名及考卷编号送主考评阅;揭榜之日,会试诸官员一般需要聚齐升堂,然后拆卷、唱名、填榜,<sup>[1]155-156</sup>整个考试实施过程谨慎严明,庄重严谨令人感叹。

## 二

本文认为影响陈夔龙科举观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 (一)儒家理想的感召

儒家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等积极入世的思想,影响了封建中国无数的读书人。陈夔龙是帝制中国典型的深受传统儒学影响的知识分子。他对自己职业生涯这样总结:“律身贵俭、治事贵勤、待人贵恕”,实际上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过、平天下”理想的真实映照。尽管幼年丧父,堕入寒门,但是他毕竟是县吏的后代,“同治甲子六月,先光禄公捐馆侨舍,……先母姜太夫人辞甘茹苦,伤亡念存,特延师课读于家,虽饔飧不给,饌食必丰。或劝使余兄弟弃学就贾,太夫人应曰:‘一息尚存,不忍使廉吏之子沦于狙佞也!’时

烽火四达,斗米千钱,太夫人以纺绩得货,藉供馆谷,往往机杼之声,与余兄弟(读书)之声彻于达旦,虽陶称截发,欧母画荻,曷以逾焉?”<sup>[3]</sup>作为帝制中国士大夫家庭的廉吏之子当以发奋读书,求取功名为人生正道,这既是引导少年陈夔龙成长的“正统”思想,也是当时社会民众的主流选择。寡母勤劳持家,陈氏兄弟勤勉苦读,他们行走在诗书传家、求取功名、辅佐朝政、实现理想的“修齐治平”的路径上,这样的人生,既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大部分人别无选择的“顺受”,也是传统儒学影响大多数书香门第之家用于熏陶后代的主动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选择,也使得“陈夔龙们”对科举考试及选材的合理性更无疑虑。

### (二)科举经历的影响

陈夔龙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中秀才,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sup>[4]</sup>按照冯尔康的统计,在所有考生中,唐代每次平均录取进士26.01人,宋代开科期间平均每次115.07人,明代91.46人,清代103.66人。<sup>[5]</sup>当时的贵州,战乱频仍,田地荒芜,文教不兴,中进士实属不易。尔后,陈夔龙因“美风仪,能文词”迁任郎中,备受赏识,仕途通畅,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对以儒家经典为主的科举教育给自己带来的深刻影响充满感怀,认为自己立身处世、为官之道中值得为后世子孙所秉承的“俭、勤、恕”等优点,也多源自他所接受的“守正”、坚守“圣贤教诲”的影响。

陈夔龙是幸运的,勤勉终有回报,不仅他自己,陈氏兄弟三人皆以科举入仕为官,凭借科举制度,寒门士子终于实现了向社会精英阶层的社会流动。作为个体的他所体察与感受到的,是这种社会制度给他本人及家族带来的利益,这样的科举人生经历,理应是他对科举制度高度认同的重要基础。

## 三

清代以来,先有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明末硕儒以经世致用之学攻击八股之弊,后有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对改革科举、选拔西学人才的美妙幻想。<sup>[6]</sup>伴随“洋务运动”,知识分子逐渐倾

向于“西学图强”之道,在晚清士大夫中,陈夔龙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废止科举制度、正面肯定科举的重要代表。需要指出的是,他认可科举制度、反对科举革废但并不排斥新式教育,他在“筹设初级师范学堂”、<sup>[2]139-140</sup>“变通学堂报功章程”、<sup>[2]144-145</sup>“拟设尊经学堂及师范传习所”<sup>[2]159-160</sup>等奏章中,多次表达了对新式人才的渴求,甚至提出不少开启民智、推进新式教育的积极策略。综观其科举观,他看到了科举制度作为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通道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肯定了科举教育及培养人才的积极价值及科举考试管理组织的正面表现。然而,囿于时代及自身的经历,他未能全面评判这种制度,也不能客观地评价科举在考试形式、内容、评价及管理等诸多方面所存在的不足,更无法提出改进的意见指引改革完善这一制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陈夔龙对科举制度的认可与他对“皇恩”的感念常常相互交织,他自己也并不掩饰这种对科举制度认可中感性的成分。因此,他的科举观,自然是局限的,然而他的不少观念,今天看来仍值得学界重视。

陈夔龙不仅看到了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渠道这一制度,在中国社会千余年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而且其对科举骤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独特体验也颇具代表性。陈夔龙对科举制度的怀想、评论,大多集中在科举废止之后他晚年的回忆记录性作品之中。本文认为,他坚决反对科举制度停废以及他对科举制度的种种思考与认识,除去自身在政治上趋于守旧因素的影响,还与1905年科举立停这一历史事件具有直接的联系。根据关晓红的考证,尽管科举制度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终极趋势不会改变,然而在1904年科举减额至1905年立停之间,科举改革的走向、方式及时间,尚存在诸多变数。科举制的终结,并非瓜熟蒂落的自然进程,而是改革派

为避免科举改革出现逆转,以非常规手段人为决策与推动的产物。由于清廷对制度变革牵一发动全身的影响估计不足,导致科举立停后留下一些隐患:低估制度变革与文化冲突之间的矛盾;政府与社会各界对全面推行新式教育的实际准备不足;配套制度跟不上导致专才与通才、治事与治民的矛盾难调。各类矛盾激化,加剧了社会动荡,改革未能“救亡”反而促其速忘。<sup>[7]</sup>身为国家重臣,陈夔龙身处一个风云巨变、国家危亡的时代,眼见列强蹂躏,亲历议和之辱,他不是彻底的守旧派,从他对李鸿章兴办“洋务”的评述<sup>[1]91</sup>及他对设立陆军、法政、师范、矿业等学堂的奏章论述显示出,他深知工业自强与人才兴国的重要。陈夔龙对科举停废之后的社会遽变有比照性的体验,经受过“科举一废,士气浮嚣”的切肤之痛后,他对培育传统士大夫形成共同价值观念的科举制度的美化与认同、对科举制度时代有序社会的怀想与念旧也就不难理解了。

#### 参考文献:

- [1]陈夔龙. 梦蕉亭杂记[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 [2]陈夔龙. 陈夔龙全集:下[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3.
- [3]徐一士. 一士类稿[Z]//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二辑.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147-148.
- [4]陈南萍. 贵阳寻根并追记祖父陈夔龙[J]. 贵州文史丛刊,2005(3):81.
- [5]冯尔康,等.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757.
- [6]陈祥龙. 梁启超“科举观”的嬗变及启示[J]. 教育与考试,2012(1):44.
- [7]关晓红. 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J]. 近代史研究,2009(4):91.

[责任编辑:翟宇]